

后殖民理论在台湾的演绎

赵稀方

本文运用“理论旅行”和“翻译研究”的方法,梳理西方后殖民理论在台湾的不同演绎。台湾场域对于后殖民理论的接受、解读和运用,取决于各自不同的文化立场。本文从本土派、外文系和左派三个不同的方面考察台湾的后殖民话语实践的脉络。

1978年赛义德《东方主义》一书发表的时候,台湾以新殖民主义批判为导向的乡土文学论战激战正酣,因此西方的后殖民主义与台湾的新殖民主义有一个时间上的错位。台湾的乡土文学论战,虽然也可以见到对于国外新殖民主义理论的运用,但主要是从内部自发产生的,因其社会经验的不同而具有独特性。直至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的台湾的后殖民实践,则主要是西方后殖民理论台湾旅行的结果。我们大体上可以从本土派、外文系和左派三种不同的角度梳理台湾后殖民话语实践的脉络。

本文系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重点科研项目成果

—

据邱贵芬自述,首次将后殖民理论引入台湾文学领域的事件是1992年她与廖朝阳在《中外文学》上的争论,“头一次挪用‘后殖民’理论一词,将西方后殖民理论搬上台面,并引以用来讨论当时台湾文化关切的问题,或许可推至廖朝阳与我在1992年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会里和会外的后续辩论”。不过,台湾本土后殖民论述的代表人物陈芳明似乎并不买帐。据陈芳明自述,他1989年在美国接触到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便开始将后殖民的思考运用于台湾本土文学建构中。

索诸早期的历史,陈芳明的思想似乎有较为突兀的变化。在1981年7月《美丽岛》杂志第48、49期上,陈芳明以“宋冬阳”的笔名发表了《缝合这一道伤口——论陈映真小说中的分离与

结合》。在这篇文章里,陈芳明称陈映真为60年代以来最有影响力的小说家,态度十分崇敬。陈芳明认为,陈映真60年代的小说中台湾人与大陆人的分离或死亡的结局,反映了那一时代以阶级差距为主要内容的省籍矛盾,但他认为,陈映真似乎过于拘泥于省籍的界限,阶级的利益应该会和解省籍的问题,比如《将军族》中同为下层阶级的瘦丫头和三角脸,应该会结合,而不是以死亡为结局。陈芳明积极评价陈映真在70年代的小说中对于省籍问题的处理,因为在陈映真这个阶段的创作中,工业化和跨国公司使得外省下一代与本省人因为共同的利益而站到了一起,阶级的维度终于取代了省籍问题。后来成为本土论述代表的陈芳明,在强调省籍、排斥阶级的时候,再回头看这篇大作,不知道有何感受?

在1984年第1期《台湾文艺》上,陈芳明又以笔名发表了《现阶段台湾文学本土化的问题》一文。短短三年,陈芳明对于陈映真的态度发生了大转折。文章对于乡土文学论战后台湾的“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台湾文学本土论”与“第三世界文学论”进行了梳理和评论。他站在“台湾意识”和“台湾文学本土论”的立场上对于“中国意识”和“第三世界文学论”的代表人物陈映真进行了无情的抨击。正因如此,这篇文章后来成为继叶石涛《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之后的又一篇台湾本土论述的代表作。

在“解严”之后台湾本土主义高涨的情形下,陈芳明很自然地将他所了解的后殖民理论应用于他的本土化建构之中。虽然《东方主义》所批判的是西方,虽然美国对于台湾的殖民控制一直是乡土文学以来民族主义的批判焦点,但在“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决裂后,陈芳明毫不犹豫地将在后殖民的矛头指向了“中国”,具体地说,是代表“中国”的台湾外来政权。在陈芳明看来,对台湾来说,“光复”以后的国民党政权是和日本殖民者同类的殖民政权,它以中华民族主义对台湾进行殖民统治。他认为,国民党戒严体制“对台湾历史、文学、语言、文化等等刻意压制与扭曲”,“对台湾文学研究的禁锢,也是透过《东方主义》书中所描写的西方白人殖民策略那样,亦即以想象、论述、实践三方面进行有计划的权力干涉。不仅如此,当权者认为,台湾历史经验的格局过于狭小化,遂径以中国的历史经验来取代台湾的这种混乱的教育方式,终于使台湾历史淹没在庞大的中国论述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陈芳明以“中国”殖民主义取代美日殖民主义,公然重新解读以乡土文学论战为代表的台湾新殖民主义批判的历史。陈芳明认为,“光复”后台湾的殖民主义并非来自美日帝国主义,而是来自内部国民党政权。现代主义的自我流放就是对于国民党殖民统治的负面抵抗,而70年代乡土文学则是一种正面抵抗,因此现代主义与乡土文学是朋友,而非敌人,他们之间的斗争原是一场误会,“从一九七二年到七三年之间出现的现代诗论战,原是检讨台湾诗人失去认同的困境。文化认同的丧失,并非是作家努力获致的,而是政治环境的封闭所致。然而,论战的批判对象并未朝向牢不可破的戒严体制,而是朝向手无寸铁的现代诗人”。“七〇年代写实的批判精神,原是为了暴露殖民地社会中偏颇的政治经济体制,但格于当时高度的思想检查的羁绊,殖民统治的本质没有受到严重的围剿,反而是六〇年代的现代主义成了代罪羔羊。从七〇年代初期的现代诗论战,一直到一九七七年的乡土文学论战,乡土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竟然成为对峙的两个阵营”。在陈芳明看来,以乡土文学论战为代表的台湾新殖民主义批判,并不是朝向“西化”的,朝向美日帝国主义的,而是朝向国民党史殖民体制的,所以他说:“一九七七年爆发的文学论战,乃是作家与统治者在意识形态上的一次对决,台湾作家王拓所揭橥的‘拥抱健康大地’,其实是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的一个回应。”

陈芳明的阐述委实太有“新意”了,可惜与历史过于悖离。乡土文学论战的文本俱在,它以美日抛弃台湾为导火索,以批判“西化”、批判美日帝国主义为内容,以民族主义为潮流,陈芳

明究竟怎样面对这些文字呢?作为乡土文学论战发轫之作的王拓的《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开始就以大量篇幅谈论台湾从美日帝国主义下的觉醒,痛心台湾“中国在近代历史上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主义传统,却完全地割断了、忽略了!”陈芳明抓住了王拓对于台湾是“殖民地经济”的批判,如获至宝,认为这是“一九四五年以来第一位台湾作家如此为台湾社会的性质定位”,是“最值得注意的”。不过,头脑清楚的人都能看得懂,王拓是说台湾成为了美国主导下的“殖民地经济”。陈芳明也看懂了,“他所说的‘经济殖民地’乃是指美国对台湾的关系而言”。不过,他继续说道:“但很清楚的,事实上这样的论述方式已经把国民政府视为经济殖民地的代理人。”这是没错的,批判美日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同时批判台湾当局,但陈芳明又接着得出了他的结论:“一个依赖经济殖民地的统治机器,本身无疑就是不折不扣的政治殖民统治。”论述的逻辑简直令人瞠目:台湾当局依赖美日殖民主义,于是乎自己成了殖民主义。

后殖民理论可能有不同说法,但都在谈论西方殖民主义与殖民地的关系。“光复”后国民党专制统治的问题,应该放在后殖民理论所谈及的民族主义的范畴中去认识。陈芳明所乐意谈到的国民党与日本人统治的相类(姑不论是否准确),正是法农所谈的警惕民族主义复制前殖民主义逻辑的现象。法农一再告诫,如果不摆脱殖民者的思维方式,殖民地独立后,民族资产阶级会沿袭殖民者的结构。不过,这并不代表本地统治者就等于西方殖民者,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是不同范畴的问题。

陈芳明对于台湾人与中国人对立的强调,可能正好落入了后殖民理论所批评的狭隘本土主义。本土论者没有认识到文化传统是开放和发展的,既没有一个可以追溯的源头,也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一味向前追溯传统,只能像剥葱一样,到头来一无所有。台湾本是大陆移民社会,如果一定要强行剥离作为台湾主体中的“中国性”的话,那么真正的台湾人只剩下原住民,陈芳明等本土论者本人也将被排除出台湾人的行列。在现代民族主义理论中,种族民族主义是臭名昭著的,它迷恋于“我族”与“他族”的差异,强调种族中心,德、日法西斯主义就是这样的一种民族主义。台湾本土论述一直强调所谓本土意识,强调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差别,甚至喊出了“反对中国猪”的口号,这里的种族主义倾向是十分危险的。陈芳明在1981年发表的《缝合这一道伤口——论陈映真小说中的分离与结合》中就已经提到,“光复”台湾的阶级问题早已经替代了省籍问题,不知道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他的思想反倒退步了。

就后殖民理论本身来说,陈芳明的运用让人感到有点兴之所至。在《后殖民台湾》一书的《自序:我的后殖民立场》一文中,陈芳明对于后现代后殖民有以下概括:“所谓后结构思考,便是指文化主体重建之际,应注意到组成主体内容的各种不同因素。”“解严后的八〇年代,见证了同志文学、女性文学、眷村文学、原住民文学的大量崛起,这是非常可观的后殖民现象”。这两种大胆的概括很不严谨的后结构特征恰恰是反对现代性的核心主体性,作者居然将其与“主体重建”连在一起,后殖民理论是处理种族问题的,不知道为什么作者将“同志文学、女性文学、眷村文学、原住民文学”称为后殖民现象?

在陈芳明的《后现代或后殖民——战后台湾文学史的一个解释》一文中,又出现了一个对于后现代与后殖民的概括:“后现代主义发源于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欧美,后殖民主义则崛起于第三世界。更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主义最终目标是在于主体的解构,而后殖民主义则在追求主体的重构。”说后殖民主义崛起于第三世界,是一个过于大胆的说法。后殖民理论家虽然多数来自第三世界,但他们是西方名校教授,如赛义德和斯皮瓦克都在哥伦比亚大学,霍米·巴巴在哈佛大学,罗伯特·扬更不用说,来自牛津大学,而且是英国白人,后殖民理论产生于西方语境,是当代西方的显学。在“东方主义”成为阿拉伯国家民族主义的反抗工具时,赛义德专

门撰文声称：“东方不是东方”，他所说的“东方”与真正的东方毫无关系。陈芳明的这种说法，看起来有点自作多情。另外，陈芳明刚刚说了后现代是“主体重建”，在这里忽然又很明白地说“后现代主义最终目标是在于主体的解构”，自相矛盾。“后殖民主义则在追求主体的重构”这个概括也不准确，主体性是现代性的原则，后殖民的一个主要特色就是吸收了法国“高雅理论”，赛义德的《东方主义》运用福柯的话语理论分析西方的东方主义话语，根本没有涉及到东方，何来“主体的重构”？

二

引人注意的是，在当代台湾后殖民建构中，外文系学者的立场较之从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知道，在乡土文学论战中，后来的左派和本土派联合起来批评“西化”，作为现代主义大本营的外文系处于负面位置。在王文兴对于乡土文学的反驳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激烈对抗。事隔十几年，在当代台湾文化场域的论争中，外文系对于历史有了反省，断然变更了立场，由反对乡土文学改为支持本土派了。这一历程，在邱贵芬的下列说明中看得很清楚：“从战后台湾文化生态来看，九〇年代几次以外文系学者为主的后殖民理论论战，可算是从六〇年代白先勇、王文兴等人引介现代主义理论之后，外文系学者再一次积极地介入本土文化的争辩，透过西方流行理论和当下台湾文化做面向的对话。但是，相较于六〇年代现代主义所强调的‘横的移植’和‘漂泊’、‘放逐’等等概念，九〇年代台湾‘后殖民’论述的演绎却自觉‘横的移植’这种外文系知识传播典范隐含的殖民架构，在挪用西方流行理论之时不断质疑‘挪用’过程牵涉的种种问题，影响所及，‘在地化’、‘本土化’等等字眼时时在此类论述里浮现并反复辩证。”从邱贵芬的话来看，当代外文系的学者已经意识到了台湾当年“横的移植”的“西化”思潮中隐含殖民结构，因此转到支持台湾本土主义的立场上，这是值得肯定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时候的台湾本土主义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复乡土文学论战时的面目，它们在“乡土”——“本土”的路上愈走愈远，对于“西化”却已经不再批判，而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矛头转向了大陆。在这种情况下，外文系学者与本土派学者的靠拢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

如此，强调台湾本土，批判中国，成了本土派和外文系学者的共识，当然，另一个共识是不批判美国以及西方帝国主义。不过，精通后殖民理论的外文系的学者与本土派的学者毕竟不同，他们明白后殖民理论反对本土主义、民族主义的基本立场。于是，他们一方面支持本土主义，另一方面又不忘反对本质主义，在两者间犹豫不决。

1992年邱贵芬在台湾比较文学会议上的发言，后以《“发现台湾”，建构台湾的后殖民论述》为题发表于台湾《中外文学》第21卷第2期上，俨然台湾后殖民主义的宣言。台湾本土论述原就存在，而邱贵芬首次有意将其与后殖民理论勾连起来。台湾历经殖民统治，倡言殖民反抗原不足为奇，但本土论述的独特之处却在于“本省人/外省人”、“台湾/中国”的对立。邱贵芬认为的确应该将1945年后的国民党统治包含于殖民统治之列，“在后现代的用法里，被殖民者乃是被迫居于依赖、边缘地位的群体，被处于优势的政治团体统治，并被视为较统治者略逊一筹的次等人种(Said, 1989, 207)。以此为定义，台湾的被殖民经验不仅限于日据时代，更需上下延伸，长达百年。”不过，反对回归本土的非本质主义，是后殖民理论的基本立场，邱贵芬究竟明白这一点。因而，她一方面认为，瓦解殖民压迫首先要从语言抵抗入手，即拒绝国语本位及中国本位的文学观，建构表达台湾经验的台湾语言；另一方面考虑到台湾的现实，主张不必将通行的台湾国语视为外来语，而承认台湾文化的“跨文化”特色。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

民理论所批评的回归纯净本土的迷思和“福佬沙文主义”的暴力倾向。

不料,邱贵芬的这一立场受到了批评。廖朝阳认为邱贵芬承认台湾国语并反对回归本源的做法,无异于接受殖民暴力,消解批判殖民性的本土运动。廖朝阳觉得邱贵芬是背上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包袱,他提出后殖民理论中有很多批评家反对后现代主义,主张本土批判,并主张以“阶段论”解决这一问题,即将后殖民视为后现代的前置状况,在这一阶段仍需抗争,“夺回主体位置”,而后现代阶段则是“以文化异质为贵”了。邱贵芬后来进行了反击,在她看来,廖朝阳显然重蹈了后殖民理论所批评的“殖民者/被殖民者”、“抗争/融合”等二元对立模式,误区在于未能明了霍米·巴巴所说的“殖民暧昧”(colonial ambivalence)状况,邱贵芬还主张以霍米·巴巴的“文化混种”(hybridity)和“学舌”(mimicry)等策略对国语进行殖民颠覆。

现在看来,邱贵芬和廖朝阳之争乃是“后殖民—本土论述”的内部之争,他们之间立场并无原则差别,只是策略之争而已。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在另外一次(1995 - 1996)“后殖民—本土论述”之争中,廖朝阳与邱贵芬则完全换位。如果说第一次廖朝阳以“后殖民抵抗”纠正邱贵芬的“后现代混合”,那么第二次则完全相反,变成了邱贵芬以“后殖民抵抗”反对廖朝阳的“后现代解构”。这次同样发生在《中外文学》上的论争,因陈昭英的《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一个文化史的考察》和陈芳明的《百年来的台湾文学与台湾风格》两篇文章引起。这两篇文章一者批评本土化运动,一者主张本土化运动。针对于主体的实质化,廖朝阳提出了解构主义的“空白主体”概念,但却受到了邱贵芬的后殖民攻击。邱贵芬认为:“廖朝阳所援以为例的女性主义论述者主要都是白人女性,其以解构主义处理认同政治问题,性质上类近后现代女性主义。如果我们考虑台湾的历史情境,将目前建构台湾身份/认同的文化论述大致归类为被殖民国家抗拒殖民中心价值体系的后殖民论述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小心厘清后现代后殖民之间的一线之隔。”上一次论争中,廖朝阳提醒邱贵芬注意后现代与后殖民的差别,邱贵芬似乎已经接受了,转而开始提醒廖朝阳了。邱贵芬进一步批评了廖朝阳的“空白主体”概念。她认为廖朝阳主张主体在认同上完全开放,就不能完全封死台湾在某一个未来的时间点采取中国认同的可能。她认为廖朝阳以“后现代”身份认同理论处理台湾主体问题十分危险,因为“如果真如廖朝阳如言,让台湾‘主体变成一无所有’,独派的理论也无法成立。陈昭瑛的问题‘台湾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又何不可’就显得不是那么天真无理了。”邱贵芬引证贝尔(Bell Hooks)在《后现代黑人性》(Postmodern Blackness)一文中的论述,强调台湾经验的“绝对重要性”。在这里,邱贵芬所强调于后殖民的,正是她在前面批评的“夺回主体”的内容,而她所批评后现代的,正是她前面褒扬的“以文化异质为贵”。看起来,邱贵芬与廖朝阳的前后换位,显示出外文系学者在本土主义“后殖民”与解构主义“后现代”之间摇摆不定。

在外文系的学者中,较为坚定地站在后现代立场上批判本土主义的是廖咸浩。廖咸浩辨析了“后殖民—本土论述”中所存在的国族认同与主体性的问题,他认为一味夸大台湾本土认同,强调本质主义,对于台湾社会具有消极作用,“族群的差异被以本质化方式夸大的同时,其他次团体之间的差异却又被刻意抹杀,长期忽视。因此,台湾的社会可以说是病得太重了”。廖咸浩强调解构本质主义,主张多元平等杂处。他认为,因为台湾不同的阶级、族群、性别都上有不同的利益,所以我们应该讨论的就不是什么我们的认同,而在于明辨认同的原则,研究不同阶层和团体的和睦相处。他认为独派思想上的迷障,是“单一主体”论,而廖朝阳引用齐切克(Slavoj Zizek)的空白主体论时候,忽略了他的“天生的内在冲突”(constitutive antagonism)论,而他认为这正是台湾更为需要的。

当然,站在解构主义的角度,廖咸浩批判一切本质主义,他既解构“台湾”,也解构“中国”,

也解构“美国”和“日本”,而因为“台湾”较近,危害更大,他将批判的矛头更多地对准台湾本土主义。不过,廖咸浩1987年自美回台后写的第一篇解构主义文章,倒是《解构中国文化》。让他失望的是,虽然自此以后台湾出现了大量的“解构”“中国”虚构性的说法,但他们解构“中国”的目却是要以台湾代之。作为解构主义的专家,廖咸浩认为,虽然“去中心”在台湾学院内外成为耳熟能详的口号,“但是,衡诸‘去中心’观念过去十年来在文化实践上的表成,则显然解构的精神非但没有落实,甚至于反而常被滥用为‘本质化’的工具——对己之所恶动辄‘解构’之,对己之所好,则解构与我何干。如此,解构不过是用来打击异己的工具罢了。”对于独统论战,廖咸浩认为两方均有问题,“若以奠基于解构思维的当代文化理论观之,便能一眼看出双方共同的盲点:双方同样坚持的‘大一统论’与‘本质论’不但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诱使思维拓成死结。因此,我当时‘解构中国’的工作是希望能在无法对话的两极之间开拓第三种可能性。”^⑪

从廖咸浩对于本土派的批评看,他虽然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解构一切,但他的倾向应该稍稍偏“左”,这一点可以从他对于陈映真的赞扬上找到佐证。1994年4月,廖咸浩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陈映真》的文章。陈映真在台湾被视为“中国认同”的象征而受到台独派攻击的时候,廖咸浩仍给予陈映真以高度评价,认为陈映真不但是台湾高压时期的“社会良心”,而且是“最早、最深入、也最客观的探讨省籍问题的作家”。当然,廖咸浩所展开的也是一种解构式的辩护方式。他这样概括陈映真:“从陈后期的小说与论著中,可以看出以下的论证方式:中国的分裂以迄今天的台独运动,都是西化的宰制阶级(小资产阶级)为争取自身的阶级利益与西方合作,而扭曲或牺牲民族利益的作为。所以,终极而言,统与独的立场不同,并非源自省籍的差异,而是阶级的差异。”^⑫廖咸浩认为,作为本省籍作家,由于陈映真对于阶级和地方性有特殊体认,因此他的民族主义其实是多元化的,可惜过于超前而不能被理解。

三

陈芳明的本土派的后殖民论述,引起了陈映真的批评,于是有了2000—2001年两人在《联合文学》上一场往复多次的大论争。在这场论争中,陈映真系列地表述了自己对于台湾殖民地性质的认识。

争论的焦点之一,在于陈芳明认为“光复”后国民党是殖民政权这样一个观点。在陈映真看来,“光复”以后的台湾是一个马克思所说的“拟波拿巴国家”,惟一的不同是台湾对于美国的依附性质。时至今日,陈映真已经十分自觉于“新殖民主义”批判立场,并以之分析台湾。陈映真明确指出,由于在经济上对于“美援”的依赖,台湾在政治、外交上成为美国反共政治的附庸,在军事上成为美国远东反共战略的前沿,在文化、思想、文学、艺术各个方面都从属于美国,“一九五〇后的台湾社会,不是什么被国府集团‘再殖民’的社会,而是美帝国主义下的新殖民社会”^⑬。在批评陈芳明混淆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时候,陈映真也提到了法农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后殖民理论的宗法师,法农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即殖民地独立后自己民族的、可能赛过殖民统治当时还要苛刻、黑暗的统治问题”。不过,由于法农并没有看到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没有看到新殖民主义问题,他只是提出了本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同构的问题,陈映真则进一步提出了殖民政权与本土政权的直接支持关系,那就是,“从战后世界史的眼界来看,这‘独立后的黑暗’,与战后美国为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在全球的扩张有密切

关系。战后不久,美国在广泛的新独立国家中保护、支持和制造了扈从于美国利益的国家所形成的新殖民主义体系”。他具体指出,从20世纪60至80年代,美国以颠覆、侵略、政治经济渗透等形式,培养、炮制了二十多个军事独裁政权。如此看来,本土法西斯政权与从前的殖民政权确有“延续性”,“其统治的残虐性、思想文化的控制、临近,确实与时代‘毫不逊色’,但如果说这些新法西斯政权下的社会是殖民地独立后各国亲美独裁政权对同胞的‘再殖民’社会,就是只有陈芳明才能说得出的笑话了”^⑭。

陈映真与陈芳明在立场上有一个反美与反中的基本差别。台湾本土派反中,自有其立场,但陈芳明一定要以西方后殖民主义建构自己的理论,则显得勉强,因为后殖民理论从根本上而言是一种对于西方殖民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批判。陈芳明将“解严”后的台湾称为后殖民时代,并写出《后殖民台湾》一书加以论述,但他却只反中国,并不反西方和美国,用陈映真的话来说,“终其全部写过的文章,从来看不见对于美国新帝国主义自五〇年代以降在军事、经济、政治、外交、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对台湾的统治。这样的脑袋出来的‘殖民地’论——‘再殖民’论可以如何荒唐,不难想象”^⑮。关于后殖民理论的批判西方的性质,陈映真的理解是正确的,他认为,“后殖民论主要地是一种文化批判的理论,一种文学批评的理论。这文化批判和文学批评又集中焦点于对于过去的殖民主义和当前的新殖民主义对被殖民者造成的心灵、文化、思想、意识形态、自我认同所造成的被害、压抑和损毁的揭破、反省与纠弹”^⑯。从此出发,他批评陈芳明对于后殖民等西方术语的套用本身就是一种后殖民现象,“陈芳明以西方后现代的性别、性取向、族群、去中心、分殊、多元……这些舶来的概念,生吞活剥,强辞夺理地描写、说明、比附台湾文学,以西方新殖民主义的文化概念描写台湾,正是后殖民批判理论的批判对象的核心”^⑰。在陈映真看来,这种现象正是台湾依附于美国意识形态的历史产物,是台湾的去殖民化的课题,“台湾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上对美国的新殖民主义的扈从化,至八五年后达到了空前的高峰。美国学园专贩过来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同性恋论述’、‘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透过留学回台老师、媒体炒作,在一知半解下成为某种‘霸权性论述’。知识分子、文艺评论家,一量离开洋人提出的问题,就不会提自己的问题;一量不用洋人的术辞语,就不会用自己的语言谈问题,鹦鹉学舌,而犹沾沾自喜。原来反对文化殖民主义的后殖民论,到了台湾,竟恰恰成为美国对台学界文化殖民的工具。而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台湾文学才表现出深刻的‘后殖民’性质——但与陈芳明所讲,已南辕北辙了”^⑱。陈映真的这种说法,是新颖而有说服力的。

不过,陈映真在谈论了后殖民理论的西方文化批判的性质后,又说,“这样的批判,绝不待赛义德的《东方论》以后才有。二十世纪初共产国际展开的反帝民族解放斗争,‘二战’以后亚非拉广泛的反对新老殖民主义战线上理论家和文学家,都有过深刻的理论和文学作品”^⑲。就此来看,陈映真还不太清楚后殖民与新殖民及殖民主义批评的差别。大体来说,对于解构主义、话语理论的吸收,对于主体及本质化的阶级和民族主义的反对,这些都是作为西学“后学”之一后殖民理论的特色,看起来这些都是陈映真所不能接受的,故而陈映真主要还是在新殖民主义的框架里进行批判。

引人注目的,是以陈光兴为代表的台湾第二代左派的出现。陈光兴有意识地继承了陈映真批判西方殖民主义的路线,他在《去帝国》一书的“导论”中谈道,“本书的主要论点深受鲁迅、陈映真、法农、霍尔·帕萨·查特基、沟口雄三所代表的批判传统的影响”。汉语文化界他所提到的人物除了鲁迅,就是陈映真^⑳。不过,陈光兴是外省第二代,外文系出身,80年代留学美国,1989年才回到台湾。这种世代、学术背景和位置,决定了他与陈映真等上一代左派的差异。

在世代上,陈光兴较为年轻,因此“解严”后台湾本土/国族主义是他所面对和批判的现实。美国留学和外文系背景,决定了陈光兴能够熟练引用并扬弃新殖民/后殖民理论。外省第二代的位置,决定了陈光兴不像陈映真等人那样认同中国大陆。既批评台湾国族主义,又不认同中国国族主义,陈光兴的位置变得十分尴尬,他干脆放弃了国族的维度而取横向弱势认同的位置。

台湾的殖民批判论述一向将自己置身于弱者的地位,批判他人,但尖锐的陈光兴却在“南进叙述”中发现台湾的殖民主体性。吊诡的是,这种殖民主体其实又是被殖民的产物,是“次帝国想象”。1994年台湾“南进叙述”的主要内容是资本输出,进军南洋,其历史资源是30年代日本的南进方案。这个以台湾为中心点的帝国南进地图,如今重新为台湾知识人发现,以来支持90年代台湾的帝国想象。让陈光兴惊讶的是,这个宏图由“自由派”以及“本土左派”等众多台湾知识人参加,但他们却“完全没意识到台湾中心论的地图想象是帝国主义的产物;一头热的支持政府南进,却没看到这一次的南进其实与上一次帝国主义的扩张逻辑是一致的”。陈光兴将这种心理称为“台湾次帝国主义的出头天情绪”^②,认为台湾在战后帝国主义扶持下,已经由殖民地跃到准帝国主义的位置,加入向下争夺市场的帝国竞争行列。

从台湾的处境出发,陈光兴对于殖民批判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认为,后殖民理论可能模糊了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的新殖民结构,而隐藏在“后殖民”背后的仍然是民族国家的幽灵。他引用法农的理论,认为殖民地国家独立后,如果不及时将国族意识转化成社会意识,那么很可能会占据殖民主的位置,对外与帝国主义相结合,成为新殖民主义,对内则实行“内部殖民”。陈光兴归纳出一个理论原型:“殖民—去殖民—新殖民/再殖民/内部殖民,纳入新殖民资本主义的运动过程。”在陈光兴看,从“南进叙述”所显示的帝国欲望来看,这个理论原型正是台湾所走的方向。所以问题就在于,“从殖民—去殖民—再殖民/新殖民的理论轴线来看,我们发现台湾次帝国欲望得以形成的意识形态基础在于:去殖民的全面性反思根本没有运转,才会承续帝国主义的文化想象”^③。台湾的去殖民何以没有完成呢?陈光兴认为,关键在于冷战格局。“二战”后,日本迅速从殖民主变成了美国的殖民地,丧失了内部去殖民化的契机,而台湾等地独立后本应该反省日本及美国的殖民统治,但冷战格局成功地将帝国主义的矛头转向了社会主义阵营和中国,真正的日本美国帝国主义反而成为靠山,于是,“在前殖民地重新发现与重新建立主体性的契机于是丧失。同时,由于日本、冲绳、台湾、南韩成为美国保护下的次殖民地,东来区内的主体性从此染上深厚的美国色彩。准确地说,美国至此之后内在于东亚,成为东亚主体性构成的一部分”^④。

在陈光兴看来,国族主义是殖民主义的一个动力,也是当代台湾很多问题的症结。他认为,台湾在历史上历经殖民,也有相当丰富的抵抗殖民的文化资源,但一直因高压统治而不能展开。直至“解严”之后,才出现多元主体(劳工、女性、原住民、环保、同志运动等)。“不幸的是,这些原本可以展开的文化去殖民空间,都在快速的为政治独立建国运动所吞噬,无法有自主性的深化,文化、学术都被吸到以统独为后设叙述主轴的磁场中”^⑤。由此,他思索的是,“如果去殖民的意义不能停留在本土化运动,那么出路何在?90年代中期台湾这一波本土化运动论点的格局,以及台湾后续政治局势的发展依然是在同样的框架中进行,均没有冲开统/独国族主义文化想象的界限,其认同对象仍然没有多元展开”。陈光兴提到了后殖民对于打破本质主义和二元对立的努力,比如离散、混合等概念,但他对此并未首肯,他认为否定殖民结构的存在,以至否认固定的文化认同,并不利于解释问题,因为殖民结构是客观存在的。不过,陈光兴认为,承认殖民结构并不意味着不需要认识到其他结构的存在。在殖民地社会,殖民体制可能是主导性结构,但仍然存在着其他社会结构,而且这些结构之间的关系是交叉的。例如,一方

面存在殖民者/被殖民者的殖民体制,另外还存在着资本家/劳工的资本主义体制,存在着男性/女性的父权体制,异性恋/同性,双性,跨性异性恋结构,陈光兴指出,弱势位置在抗议强势,但其潜在的效果是对于体制/结构的不断复制和强调,因而,在殖民体制、资本主义、父权体制、异性恋体制强势早已结盟,而弱势被分裂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做的是弱势的结盟。本土化运动在重建主体的时候,不能单一地以殖民者为对象,而应该寻找多元的认同对象。陈光兴的横向弱势认同,作为一种方法,主要限制在亚洲的范围内。他认为,在美国及西方内在化于台湾等地的时候,以美国和西方为对象的去殖民反而容易巩固了西方/东方的欲望结构,因而不如以亚洲为中心,亚洲社会内部不同的社会能够成为彼此的参考点。一旦对话对象转移,多元化的参考构架进入视野,就能形成亚洲另类实践的视野,从而贡献于全球学术生产,“通过这个运动,才能证明全球化的想象不应该只是简单的美国化,而应根植于在地经验、多元参照思考和具有丰富、开放性格的民主实践”^⑤。

在本土主义成为台湾文化主流的历史语境下,台湾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反省失去了机遇。本土派在台湾人丁兴旺,左派却江河日下,陈光兴在《去冷战》一文中曾谈到自己的承传和境遇:“我个人对于冷战及殖民主义的思考虽然不是直接受到陈(映真)先生的影响,但他是在台湾提出这些问题的先驱,我的想法可以说只是承续了他所开启的论述空间,同时也分享了他台湾社会提出亚洲、特别是第三世界问题时的孤寂。”^⑥

①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划分只是大致的,其中存在着种种交错的关系,比如左派的陈光兴是外文系的,而本土派的陈芳明则自称左派。

②⑤ 邱贵芬《后殖民的台湾演绎》《后殖民及其外》,台湾麦田出版社2003年版,第265页,第259页。

③ 陈芳明《自序:我的后殖民立场》《后殖民台湾》,台湾麦田出版社2007年版,第9—20页。

④ 陈芳明《后现代或后殖民——战后台湾文学史的一个解释》《后殖民台湾》,第23—47页。

⑥ 《“发现台湾”建构台湾的后殖民论述》一文宣读于“十年台湾文化研究的回顾”研讨会,国科会、文化研究协会主办,1999年9月,第18—19页。

⑦ 参见廖朝阳《评邱贵芬〈发现台湾:建构台湾后殖民论述〉》、《是四不像,还是虎豹狮象》,载《中外文学》第21卷第3期。

⑧ 邱贵芬《是后殖民,不是后现代——再谈台湾的身份认同》,载《中外文学》第23卷11期。

⑨ 廖朝阳《中国人的悲情:回应陈昭英并论文化建构与民族认同》,载《中外文学》第23卷第10期;邱贵芬《是后殖民,不是后现代——再谈台湾身份/认同政治》。

⑩ 廖咸浩《超越国族:为什么要谈认同?》,载《中外文学》第24卷第4期。

⑪ 廖咸浩《爱与解构——当代台湾文学评论与文化观察》“序”《解构,是因为爱》,第11页。

⑫ 廖咸浩《论陈映真》《爱与解构——当代台湾文学评论与文化观察》,第176页。

⑬⑭ 陈映真《以意识形态代替科学知识的灾难》,载《联合文学》2007年7月号。

⑮⑯⑰ 陈映真《关于“台湾社会性质”的进一步讨论》,载《联合文学》2000年9月号。

⑱⑲ 陈映真《陈芳明历史三阶段论和台湾新文学史论可以休矣》,载《联合文学》2000年12月号。

⑳㉑㉒㉓㉔ 陈光兴《去帝国:亚洲作为方法》,台湾行人出版社2006年版,第21页,第24页,第93页,第12页,第418页,第245页。

㉕ 陈光兴《去殖民的文化研究》,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96年1月第21期。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 宋蒙